

李 LIGEFEIZHUAN

格

非

邵江天
著

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格非传

邵江天 著

LIGEFEIFHI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格非传/邵江天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2

ISBN 7 - 216 - 04939 - X

- I. 李…
- II. 邵…
- III. 李格非—传记—画册
- IV. K825.4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077 号

李格非传

邵江天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安陆鼎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7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218 千字
版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1 - 2 000
书号:ISBN 7 - 216 - 04939 - X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7.5
插页:1
印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李格非

序 一

于 溪

李格非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年多了。每提起李格非，便会想起《汉语大字典》，每看到和说到《汉语大字典》，也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李格非，想起编辑出版《汉语大字典》那长达十余年的艰苦历程，想起那特殊历史条件下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格非先生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以及他对《汉语大字典》的重大贡献。

我和格非相识于 1975 年 5 月，结缘于《汉语大字典》。

大家都还会记得，那是“四人帮”肆虐的大动乱的年代，生产停滞，生活艰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文化出版界也是一片荒芜。这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复出，代替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主政。他坚定地拨乱反正，狠抓了全面整顿的工作，中国阴霾密布的天空，透出了一道阳光，给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希望。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遵照国务院的批示，不失时机地主持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于 5 月 23 日至 6 月 17 日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 18 个省市的文教和出版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我们湖北省除了格非和我以外还有其他两位同志参加。

列入会议规划要编写出版的中外语文词典大大小小总共 160 部。会议开头是提高认识的务虚阶段。

接着，就要落实规划，由各省市代表自己选择所愿意和能够承担的项目。中小型项目落实得比较顺利，但好多天了，像《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这样的大型重点项目，却一直没有省市敢于出面承担，任务迟迟没法落实。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观望和沉默，使会场空气变得十分沉闷。我和格非身处其中，思想上翻江倒海，想得很

多。那时，由于国内中外文词典十分匮乏，已经对教学、科研、生产、国防和外事活动等多方面，产生了严重影响。外国友人来访，送给我们厚厚的多卷本词典和百科全书，我们却只能回赠一本小小《新华字典》。联合国早已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却因为我们没有出版适用的词典，只能继续使用台湾编写的汉语词典。作为出版工作者，我感到屈辱，感到羞愧，感到尽快改变这种“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我又十分担心。根据会前调查，我们省还从来没有人编写和出版过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小最小的词典，像《汉语大字典》这样的大型项目，编写的规模大，涉及的方面广，动员的力量多，完成的时间长，又要求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要求能反映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国家水平，我们能编出来吗？编出来了，能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的认可吗？放弃吧，不甘心；承担下来吧，又感到底气不足。一时火急攻心，脸也肿起来了，不得不去看急诊。格非是语言文字学的专家，当然比我更了解这趟水的深浅，他为人谨慎，自然考虑得比我更深些，顾虑也更多些。但是，共同的历史责任感让我们想到了一起。于是，我们就在会后一起仔细分析我省语言学界的情况，一条一条地查摆有利因素，考虑如何创造条件去克服不利因素。仔细权衡之后，我们终于下了决心：要揭下这章“皇榜”。这决定一作出，无异于爆了个大冷门，立刻打破了会议的沉寂，一时成了会场上下的头号新闻。

作出这一决策，格非是有大功的。他不点头，我不敢拍板。我不坚定的支持，他也不敢下定决心，格非是我的胆，我只是他的肩膀。三十年后回过头看，当时我们不接这个任务，也终归有人承担，《汉语大字典》迟早总会编得出来。可是，如果让这机会擦肩而过，损失就太大了。经过大家十多年寒暑无间的不懈努力，《汉语大字典》这项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终于胜利完成，一举改变了“大国家，小字典”

的落后面貌,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和社会的认可,被誉为语言文字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尽管它还留下了不少遗憾,但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纵观今天的出版界,不说全国,仅就本省而言,各类辞书的出版有如雨后春笋,由大字典派生出来的辞书一部接一部。湖北辞书出版的繁荣和发展,和《汉语大字典》大有关系。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还锻炼出了一支能打大仗打硬仗的队伍。许多编写人员,后来都成了各个高等院校的业务骨干和各类辞书编纂的主力军。

湖北接下《汉语大字典》的编写任务以后,四川表示愿意协作,商定由湖北牵头。按《康熙字典》的字头数分配任务,湖北承担前面的百分之六十,四川承担后面的百分之四十。湖北省的各个编写组,又由武汉大学牵头。工作开始的头几年,组织队伍,省内各组的分工和协作,收字、字形、审音等专业组的组成,资料建设方案的确定,《编写方案》和《编写细则》的草拟,试编和初编工作的开展等等,都主要在格非的主持下顺利进行。几年之后,上级领导决定由四川大学年过八旬的徐中舒先生出任主编,但编写任务没有改变,湖北省在格非先生为首的编委会领导下,支撑了《汉语大字典》的大半壁江山。上世纪80年代末,格非先生还担任了《汉语大字典(简编本)》的主编。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字典》的编成和出版,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协作表现在川鄂两省之间,两省十多个编写组之间,贯穿了整个编写出版过程的方方面面。由于人们的学术观点、思维方式、认识能力以及看问题的视点和视角的差异,常常会看法的不一致,行动的不协调,这是正常现象。有矛盾怎么办?只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多沟通,多商量。一次不行就多次,会上不行就会后,直到取得共识。在这方面,领导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格非则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两省团结协作,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有的人,常常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而难办,格非却善于把复杂梳理成简单。这是一种高境界。这

种高境界缘于他为人坦荡、谦和、真诚、厚道，视名利如浮云。为了大局，为了工作，处处让人而从不觉得自己吃了亏。对人赤诚宛若童真，即使在那个动辄就可能以言获罪的特殊年代，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与之共事而不必设防的人，一位可以深加信赖的朋友。《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出版过程长达十多年，川鄂两省之间，省内各编写组之间，在团结协作上都没有发生问题，格非之功，不可泯没。

格非是我省编写工作的主帅，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社会知名度，他的人格魅力，使我省的编写队伍能够很好地凝聚在一起。他平易近人，对同志充满爱心，关爱他人胜过爱他自己。相处这么多年，听他说得最多的是某某人的优点、长处，是某某人有什么困难，应当帮助解决。而当时，他自己的困难也不少，身体不好，老伴常卧病在床，这些他从来不说。而提到某某人的困难应当帮助解决时，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提高嗓门，激动得眼圈发红。他因公外出，很少要求学校派车，经常像年轻人一样排长队，去挤当时很难挤上而且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他有教授名人的风度，却没有名人的架子，像一头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格非先生走完了他无愧无悔的一生。论学术成就，他有鸿篇巨著流传后世；论人品，他是一名合格的好党员。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他是一位深受人们敬爱的长者。

《李格非传》即将问世，作者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很想以自己的真实感受说说真实的李格非，但我知道这很难做到。我只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获得一些做人的启示，了解并记住这一位曾经为我国文化建设作过大贡献的可敬可爱的老先生。

序二

胡澍坤

能为我敬爱的格非先生传记作序是我的荣幸，但同时作为晚辈也倍感压力：一方面是因为专业的差异，先生是汉语专业，而我是世界史专业，感到很难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学术成就是先生一生成就中的核心部分。另一方面，本人才疏学浅，而先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出口成诗的大学者，生怕写得不好，让先生在天国见笑。承蒙格非先生的大公子而周先生、二公子也周教授的盛情相托，一定要我作序，推辞再三而未果，只好应命。好在《李格非传》作者邵江天先生对格非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作了全面、生动而有深度的描述。在《李格非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先生一生影响海内外的重大学术贡献、不计名利的思想境界、为国为民的奋斗精神、为人为学的道德风范、儒雅博学的大家风度、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甘为人梯的园丁情怀、谦虚谨慎的高深修养、通晓诗词歌赋的过人才识，一位德高望重的汉语言学大师辉煌的生涯，一幕一幕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的面前。相比之下，我对先生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少。因而，我只能就自己与格非先生的有限接触写点追忆和感想，以谢先生生前对我的教诲，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出版序言。

出于专业不同和年龄差距，我和格非先生的直接交往不是太多。我印象中的格非先生是位饱学之士，学术功底厚重，学术造诣很深，但治学极其严谨，不轻易发表论著，真正是厚积而薄发。因此，我非常敬重格非先生。

格非先生十分谦虚，以诚待人，以礼待人，乐于助人，尤其是对青年人，总是以朋友的平等身份商讨问题，发表意见，所以，我们青年教师也乐于向先生求教。记得大约是1972年春，学校在湖滨六舍举办

学习马恩六本著作读书班,我有幸能与历史系吴于廑先生、中文系李格非先生同班读书学习。中间休息时,我经常陪同两位先生在东湖边漫步,两位先生谈古论今、吟诗赏词,遨游在知识的时空里,那种学术大师的境界和修养,让我仰慕不已,使我深深感到知识贫乏是人生的重大缺憾,而学业有专攻对人生是多么的重要,由此促使我下定决心当一名有专长的人民教师。

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政治挂帅时期,学校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重政治,轻业务,作为个人能当干部是受重用,而如放弃干部当教师则为军、工宣队所不理解。因而,我向工、军宣队要求从干部(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转向教师,到世界史教研室工作,经历了三年的漫长时间。1975年秋天,我终于回到了教师的岗位,已近而立之年。那时,仍在“文革”时期,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作为青年教师,或到干校劳动,或带学生到工厂实习,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自己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十分焦虑。大约在1977年春的一天,我参加了历史系的政治学习后在回家路上与格非先生同行,向先生坦陈了自己的想法。格非先生鼓励我说,文科教师多一点社会经历也不一定是坏事,见多而识广,既可以在风风雨雨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又可以在风风雨雨中培养分析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对以后的业务发展是有好处的。格非先生又说,我当青年教师时,处于战乱时期,流离颠沛,没有好的读书环境,真正坐下来做学问已是三十多岁了。格非先生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那就是不要将“文革”十年的经历当包袱,而要当成人生难得的财富和动力,这对于我树立自信心,坚定不移地走向学术之路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我今天在世界史学术研究方面小有进步,那应该说是得益于格非先生的教导。

在我的印象中,格非先生是位国际学者,尤其在日本汉学界颇有影响。1980年,我陪同唐长孺先生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时,多次见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吉川忠夫教授。吉川忠夫先生是日本

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公子。据吉川忠夫先生和京都大学其他先生讲，吉川幸次郎非常尊崇国学大师、武汉大学教授黄侃先生，但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吉川幸次郎先生想拜访黄侃先生的宿愿未能实现，被引为终生遗憾。1963年秋至1964年春，中国派出一个由各学科著名专家组成的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格非先生作为语言文字学专家成为该团成员，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达5个月之久。在日讲学期间，格非先生结识了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两人以汉诗唱和互赠，遂结为莫逆之交。1980年，武汉大学副校长童懋林教授随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与东京大学齐名的京都大学主动要求与武汉大学结为姊妹学校。据童副校长介绍，日本与中国的大学已近半世纪无交流关系，京都大学之所以要求与武汉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其重要原因是吉川幸次郎先生对黄侃先生的崇敬与与李格非先生的深厚友情。我在京都大学时，我的老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也曾谈到1963年与格非先生会见一事。可见，格非先生在日本讲学不仅显示了他的高深学问，赢得了日本同行的赞赏，而且为武汉大学与京都大学建立交流关系起了架桥铺路的作用，在两校交流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一个人生理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的生命却是无限的。格非先生虽然已告别人世远赴天国，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学术贡献、治学精神、行为风范，已作为宝贵遗产永留人间。作为晚辈，我们要加以传承光大，才是对格非先生的最好纪念。

衷心祝贺《李格非传》问世，衷心感谢作者邵江天先生。

2006年10月26日于珞珈山

序 三

王宁

今年10月，世妹李山拿来邵江天先生为格非先生写的传记，希望我在传记前写点什么。我多次读了这本传记，每每陷于难以平静的情绪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这里说的话，难以表达自己的所想，只能说明自己纪念格非先生的一点真诚。

读完传记，首先是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涌入我的心头。

我第一次见到李格非先生是在1986年，那一年，黄耀先(焯)先生去世后，他的第一位博士丁忱完成了论文，决定在北师大由陆宗达先生主持答辩。格非先生亲自带人来到北师大。我当时刚从青海调来北师大作陆宗达先生的助手，奉师命协助武汉大学来的答辩委员会秘书布置会场、起草决议、做好会议前后的准备和收尾工作。但是在答辩会的前夕，陆先生忽然提出来，要把我补进答辩委员会做答辩委员。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我对陆先生说，不要麻烦了，会场上总有些事要料理，我跑来跑去方便一些，再说，都是老师辈的专家，我也不够资格。先生见我这样说，也就同意了。可是到了晚上七点钟，格非先生忽然亲自到我家里来，通知我“明天要参加答辩委员会”，他说：“陆先生的意见提醒了我们，是我们想得不周到，你明天除了读其他外审专家的评议书，一定要发表自己的评论意见。”八点多钟，他又派丁忱师弟来我家，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准备好发言。那时博士生答辩是一件特别隆重的事，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没有走入学术殿堂的小学生，和很多师辈坐在一起，十分紧张。答辩结束后，我把整理好的全部材料交给格非先生，很想对他的提携表示感谢，不料他却连连感谢陆先生帮了武汉大学的忙，也连连感谢我，说我安排会议如何紧凑，处理事情如何细致，材料整理如何有水平……我要说的话一句

也没有说出口。

第二次见格非先生是在《汉语大字典》征求各位顾问意见的会上，陆先生要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会。因为第一次见格非先生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很想再和格非先生说点什么，没有料到仅在门口见到格非先生两面，直到开会，他才出现在会场上。此前，他一直在门口迎接各位老先生来，饭后，他又一直站在门口送各位老先生走。那种场合，本来轮不到我说话，可是格非先生来去跟陆先生说完后，都主动跟我打招呼，要我招呼好陆先生，好好帮陆先生整理文章。回来的路上，陆先生对我说：“李格非是个礼数特别周到的人，其实学问很好，只是人过于谦虚，一点都不张扬，他是个不矜功的君子。《汉语大字典》其实离不了他。”

陆先生的话，在此后我与格非先生的接触中，不断得到证实：我到武汉开会时两次去拜访格非先生，一次在珞珈山上，一次在离武汉大学较远的他女儿家里，两次都是他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但每次我告辞时他都坚持要送出来，一再劝止也不肯停步。1996年在武汉大学开纪念黄季刚先生学术研讨会，大会决定由格非先生作开幕词，我作闭幕词。我到的那天早上，格非先生就打电话到招待所我住的房间，告诉我他要说些什么，说要听听我的意见。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很是惭愧，论理我是晚辈，应当想到主动与格非先生请教和沟通，但居然没有想到！还有一次格非先生来北京，一定让人陪着来看我，当时他走路已经不太稳当，我坚持不让他来，要自己过去，但他执意不肯，不告诉我住处，还是自己来了。那一次，格非先生送给我一枚小巧的图章籽料，现在，这枚籽料已经成为珍贵的永久的纪念了！

在没有读过《李格非传》的时候，格非先生的经历我们知之无多，仅仅知道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刘博平先生的弟子，曾经在苏联全面讲授章黄之学的“小学”、文学和经学，是把中国国学传到苏联去的重要学者。50年代对苏联的向往，80年代对章黄的崇敬，已经使我

们对格非先生的经历和学识十分钦佩。几次见面后，感受了他的谦虚、平易和对人的关怀，当然更加深了印象。待到读了格非先生的传记，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对格非先生的人格才有了更深的了解，知道他为人学的所有表现都不是偶然的。他是那种属于仁人君子类型的长者，在今天，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那种解救朋友于危难之中和资助弱者的无私，近于迂阔；对无意给过自己巨大伤害的人的谅解、宽容，看似愚钝；对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对后学的提携，甚至让人感到有失身份……但是，格非先生的言行几十年如一日，完全成了习惯，毫无做作；那些从心底流露出的情真意切的诗词磊落透明，不须任何矫饰。他的确常常想着别人而忘记自己，他不是“伟人”，但是“真人”。

《李格非传》多次提到，格非先生的论著不多，但是，传记中提到的那些学术见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有很多自己独到的体会，那种文风，是今天那些故弄玄虚、标新立异的“高手”永远难以企及的。汉语词源学大约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才有了一点理论，但格非先生在 50 年代就已经讲得比较透彻了。音韵学与方言学的结合，到 2006 年还有人视为一种创新，格非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操作要领，并且指出音韵研究与文字、词汇研究不能脱节。粘、拗、救是诗词格律中难以把握的概念，格非先生讲起来轻松自如，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他的学问里没有故作高深，有的只是平易近人，让人明白……什么叫学问？什么是有学问？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答案是如此不同！

《李格非传》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传记，没有太多的加工与修饰，也没夸饰之弊与吹捧之嫌，有的只是一件件的真事，让人看了——特别是我们这些与格非先生认识和交往过的人看了，聚成了一种由衷的敬佩和深切的忆念，也从心底检讨自己的不足。

读完《李格非传》，我总是想起《荀子·正名篇》的几句话：“以仁

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我觉得,这三句话,应当是格非先生为人
与为学的写照。

言有尽而意难终,前面我说过,今天已经很少见到格非先生这样
的人了,但他的精神会感染后人,激励人洗涤自私与虚荣,求真,求实,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2006年11月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序 四

好人一路平安

——读李格非先生传

缪俊杰

西方有位著名传记作家说过：“一切好人的幸运就在于：他们自己死后，美德之荣誉扶摇直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纽马·庞比琉斯》）译文虽不甚美，其意却很清楚，所说大概就是佛语中“善有善报”的意思吧！恩师李格非先生就是这样一种好人。格非先生生前并不显赫。他在一所大学里默默耕耘数十年，终老在教师的岗位上。但他作为一个博学多才的教授，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特别是他诲人不倦的师德，惜生如子的爱心，简朴平易的作风，一直受到师生们的尊敬。他辞世之后，他的学生、朋友们愈来愈怀念他。他的“美德之荣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着他的学生们和他的子孙后代，奋力前进。

我作为李格非先生的学生，对他怀有特殊的尊敬之情。上世纪50年代，我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其时中文系人气热旺，学风鼎盛，教师中所谓“五老”“八中”，在学生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我记得，当时的“五老”——刘永济、刘博平、陈登恪、席鲁思、黄焯及“八中”——程千帆、刘绶松、李健章、胡国瑞、沈祖芬、周大朴、李格非、缪昆，都亲自为我们授课。“八中”里，我印象最深而后来接触最多而成为“忘年交”的师长就是李格非先生。当时我对李先生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认真和谦和。他进教室，同学们起立，说一声“老师好”！李先生必深深鞠一躬还礼。即使是个别求教，解答之后，李先生也必以鞠躬还礼告辞，谦恭和真诚令人感动。李先生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抑扬

顿挫,解读得十分认真。后来,李先生应聘赴莫斯科讲学,为苏联“老大哥”传道授业。但同学们对他并没淡忘,他从苏联回国后,继续在武汉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毕业离开武大之后到北京学习和工作,同李老师见面机会少了,但由于某种机缘,我同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每次回武汉必定去拜访李先生。而李先生到北京,也必约我见面,有时甚至屈驾亲临寒舍,叙谈友情。李先生总是以亦师亦友之情,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记得我在中国人大读研究生时,正值困难时期,饥肠辘辘,不在言中。格非老师和绶松老师到北京开会时,住在大饭店里,伙食当然较好。他们便用节省下来的饭票请我们去吃饭,说大家一起“打牙祭”。今天看来这是区区小事,而在那时就是老师对学生一种最热切的关怀啊,令我至今难忘。“文革”十年,知识分子多遭劫难。听说李先生也受了许多苦,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而遭受种种折磨。那些年,我们联系很少,声息几无。直到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才稍有松动。大概是1972年吧,我因公去湖北。从水果湖那边坐公共汽车到武大。一下车,见一苍老而头发蓬乱的长者,带着红袖标,在车站上维持秩序。定睛一看,是李格非先生。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我心目中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何以“斯文扫地”至此!当晚我去拜访李先生。他淡然一笑,说:“这是我在接受‘再教育’”。不过据他说,这种境遇比在“牛棚”里劳改好多了,已经恢复了自由,能够在别人上下车时维持秩序,已经算是有了一点人格尊严了。他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溢于言表。

格非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忘我精神也受到同学们的尊敬。改革开放之后,李格非先生承担了国务院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汉语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他领导武大古籍研究所和中文系汉语教师,编《汉语大辞典》。这个近两千万字的文字工程,李先生和川鄂两省的几百位学者同事们经历十年寒暑,终成大业,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甘苦不待细言,格非先生功不可没。